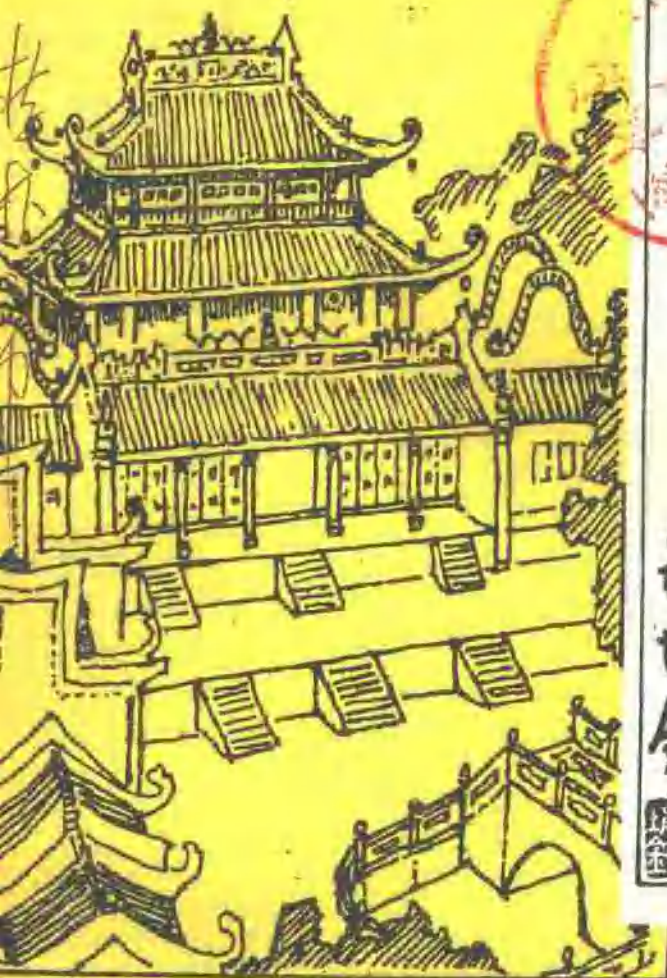


2002



恭城文史资料

朱培钧



政协恭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九月

(3)

恭城县文史资料

目 录

地方沿革 龙虎关划界的经过.....唐洪魁(1)

历史 林岑楼.....林劲秋(3)

人物 王国英.....唐洪魁(5)

历史资料 升平军在恭城.....傅 秀(7)

红军佯攻龙虎关.....傅 艳(10)

剿匪斗争 搜剿与招抚——嘉会区剿匪斗争片断
(续).....周蔚伟(12)

抗日烽火 记栗木大合黑岩之战.....欧阳群乐(17)

忆恭城敌后青年抗日救亡队.....刘善纯(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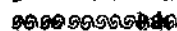
恭城、阳朔农民和桂林难民护送并热情招待美国空军飞行员纪实.....黎远明(25)

文、教 古庙钟声
——对恭城县师的点滴回忆.....宁士修(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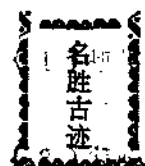
史话 忆《怒涛》.....陈粹章(33)



经济史话 恭城黄糖发展史话.....梁凡夫 (36)



民族史料 八岩“瑶圩”概况.....陈硕章 (39)



恭城文笔塔始末.....石 页 (45)

金芝寺今昔.....陈硕章 (50)

银殿山名的来历.....李健宁 (54)



恭城文庙《孔子赞并序》碑

及《四配赞》碑今译.....吴平益 (55)

龙在孔庙知多少.....俸 艳 (62)



茶江诗联选辑.....颜春盛等供稿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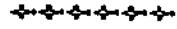
梁凡夫



艺坛纪事 《朱培钧画展》在京举办.....吴青鹤 (71)



来信简报 读者来信简报.....编辑组 (73)



上期更正 上期 (第二期) 错漏更正表..... (75)



(封面设计: 刘万鉴 封面题字: 朱培钧)

龙虎关划界的经过

唐洪魁

龙虎关位于湖南、广西两省(区)交界之处。民国18年(1929年)前,龙虎街原分湖南街与广西街两段,在街中心财福宫(今税所门口)旁有五尺宽的巷道为界,各立碑砌大闸门,名叫双闸门。广西街之闸门有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立的“恭城县界”石碑,湖南街闸门虽早已拆除,但在界巷中也曾挖出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立的“永明县界”石碑。因此,历来有龙虎街中一脚可跨两省之说。

由于龙虎街地处两省边陲,双方政府鞭长莫及,长期成为两不管之地。作奸犯科之人在此作案,如被追查,只要越过闸门,就跨出了省界,逍遥法外。否则要经过双方政府辗转联系,才能追究,实在不便管理,故而赌博、偷盗、吸毒、娼娼之事,屡有发生。为了确保地方安全,民国18年(1929年),湖南街及黄沙湾的100户群众,主动请求编入广西户籍,并由恭城县编订门牌。自此,湖南街、黄沙湾的户籍,办学、粮赋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均属广西恭城县九板乡管理。原广西街为龙虎第一街,湖南街为第二街。两街民众,溶为一体。民国20年(1931年),因广西军队出兵支援黑龙江军队抵抗日军侵略,恭城县民团副司

令吴锦源奉命驻防龙虎关，在距离龙虎街东北二里许之狮中岭、塞水岭各岭顶建立碉堡一座，在两岭北面脚下峡口处建立关门一座，并亲笔题名“桂门关”于门端，以此为湘桂省界，关门两侧筑有上砖墙和战壕（现仍存有遗迹），以作军事防御。

到了民国30年（1941年），永明、恭城两县曾因龙虎关划界问题，引起过一次争端。永明县政府要求恢复原来双闸门的界线，经湘、桂两省政府协商，联合派员到现场会勘调处。是年6月26日，湖南省派委员胡以诚及永明县长李宽远，广西省派咨议余明尊、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田良骥及恭城县长朱蘧章等，一同到达龙虎查勘地形，征求意见。当晚原湖南街在财福宫召开民众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少部分人认为龙虎街素为米市，一向仰给于湖南，如果划给恭城管辖，唯恐湖南封关绝粮，主张仍旧划回湖南。大部分人认为，自民国18年划归恭城后，无论儿童就学，行政管理、社会治安、纳粮交税等，都由恭城处理，以继续划归广西恭城有利。表决结果，赞成划归广西者53人，赞成划归湖南者39人。双方会勘人员协商，湖南方面认为，永明县道光、光绪两届县志记载，旧界系荆子嵴（即虎头岭）与镇峡峰（即龙头岭），两山隔扶灵水（即龙虎河）及龙虎街为界，经勘得龙虎街原分湖南街与广西街两段，中间有界巷，两县各有界碑。民国20年恭城建立桂门关后，附近山头未曾新定界线，应依勘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恢复荆子嵴与镇峡峰之旧界线。而广西方面认为，依据历史关系及界碑，旧界显明，原为无可否认之事实，但龙虎关湖南街、广西街虽

有显明界巷，而咫尺密接，实为一条完整的街道，为便于行政管理，自以划归一省管理为宜。否则两省政令不一，管辖权限各属，人民对于政府应履行之义务不易分清，作奸犯科，更容易越界逃避罪责。至于应该划归何省为宜，根据近十年之情形而论，龙虎两街人民既已习惯于广西行政管理，依勘界条例第二条规定，自以划归广西为妥。两方意见，未能统一，当场写出会勘情况报告，连同地方群众意见，附具绘图，分报两省政府核夺。此后，两省政府多次通函协商，仍无结果。民国31年（1942年）1月，中央内政部派出科长汪振国、编审万耀南与双方代表再次到龙虎关会勘。根据自然地形、群众意见和便于管理，最后裁定湖南街及黄沙湾仍按民国18年之决定划归广西恭城管理。界线按民国20年建的门关为界，西接寨水岭顶过龙虎河至虎头岭柑子壩，东接狮子岭顶向南绕过黄沙湾背后岭顶至龙头岭天子坪。至此，龙虎关这一划界争端始告平息。

林 岑 楼

林 劲 秋

林岑楼，又名启崇，本县著名中医师。清光绪十八年（1892）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城厢满塘村。1978年8月10日病逝于县城。终年86岁。一生业精岐黄，尤其擅长内、妇科。

岑楼幼时曾就学于本县高等小学堂，广东善乡那种痘师

卒業。19岁开始跟随叔父林株臣学医。37岁开始专业行医，40岁主方于城厢同仁堂，历时6年。后曾任恭城县司法分庭医生，县立医务所所长、恭城国中校医。解放后，1953年在城厢镇开设“林岑楼诊所”，1954年筹建“城厢镇中西医联合诊所”，任主任职，同年当选为广西省中医代表会议代表，恭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城厢镇人民代表，恭城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1956年4月调任平乐专区人民医院中医师，8月又调任广西省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1963年晋升为广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主持附属医院妇科临床及临床教学业务工作，并在高干诊室主方。及至1974年4月退休回县城居住后，登门求医者仍然不少。生前著有《中医临症效方歌》一册，医案数卷。可惜晚年受左倾路线影响，未能专心著述，故而尚为手稿，未能付印。

岑楼行医，专以治病扶危为宗旨，无论病人贫富，均能热情接诊。为了减轻病人经济负担，拒绝请轿备马接送，常常步行数十里，每遇贫困病人，他还常常解囊相助。解放后更加兢兢业业。有时自己处于病中，仍然热情接诊病人。诊治周详，待人和蔼，及至晚年，仍然手不释卷，力求进取，辨证准确，处方严谨，常使病人起于沉疴。

一次有位姓唐的妇女，41岁，月经愆期，平日少腹胀痛，经期更甚。历时两年，医治无效。前医误诊为血热，处以寒凉药方，胀满频增，食纳减少，胸部不舒。改用滋阴处方，则痞满加剧，食则呕吐，屡治不愈。后来岑楼见病者面色暗淡微黑，舌白苔滑，疲困懒言，四肢欠温，小便涩少，脉

搏沉弱迟滞，即确诊为脾胃虚寒，气血失温，凝滞子宫而导致痛经。于是投以加味吴茱萸汤，服一剂后少腹胀满稍减，胸痛已除。服二剂后小便增多，呕逆平息，饮食增加，四肢转温，连服原方五剂，大为好转。两年沉痾，数日而起。在省中医院时，曾有一妇女刘某，时年33岁。患胃脘疼痛，屡经中西医检查治疗，诊为胃溃疡。医治一年多，均无效果。自诉胃痛日久，时作时止，大便不调，数日一次或一日数次，黄黑夹杂，濇结相间，饮食减少，食后暖气吞酸，胸胁不适，按之略舒，每到下午更为严重，舌苔黄滑边红，面色苍暗，脉濡而近弦，右关浮滑。诊断为饥饱失常，劳倦内伤，厥阴肝气横恣。前医均投辛温香燥之药，肝血益耗，胃阴益竭。遂处益肝平胃之药，一剂开始见效。原方加味再服三剂而胃痛止。年余沉痾，数日而愈。可见他对内、妇科辨证论治之功力。

岑楼行医师古而不泥于古，他常道：“学如采百花酿蜜，兼收才能溢香，博取众家之长，才能临症裕余。”“行医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心细才能辨证准确，胆大才能用药的当。”

王 国 英

唐 洪 魁

王国英，又名绍雄，男，汉族，城厢镇兴隆街人。民国2年（1913年）2月12日生，1976年3月20日病逝，终年63岁。

1932年，王国英从桂林私立中山中学毕业回家后，曾任兴隆街副街长，民团后备队七十二队副队长。1935年开始经商，开办“王润记”商号，经营杂货、土产、棉布等，拥有价值3万多元的巨额资产。1943年被选为恭城县工商联常务理事，参议会议员。解放后，拥护党的领导，先后被选举和任命为县工商联主任，公私合营恭城电厂董事长，大有联营代销店经理，县纺织品商店，城关商店，城厢供销部、县食品公司、百货公司副经理、商业局畜场副场长等职。1956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被选为县人民代表，第二、五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解放初期，王国英对党的政策不甚了解，一度产生过怀疑情绪，经过工商界组织学习《共同纲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文件，联系新中国伟大成就的实际，他的思想不断产生飞跃，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建立一个伟大富强的新中国，必须彻底摧毁剥削压迫的腐朽制度。因此，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951年减租退押，他主动清退所有租债给农民；抗美援朝捐献中，他首先慷慨解囊，多次捐献，其中一次多达1万元（原旧币1亿元）。1952年，县人民政府为了发展地方工业，建设新恭城，发动群众集资创建恭城第一个公私合营火力电厂，他又踊跃投资5000元（原旧币5000万元），并担任电厂董事长，与江振威、洪学智等全力筹备，1953年元旦投产发电，是年，为了扩大电厂碾米加工，他又将自己在群益土产联营社的5000元（原旧币

5000万元)股金全部转入电厂,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又将在公私合营棉布业的3800元资金全部直接过度到国营花纱布公司,并主动表示放弃定息,依靠本人工资维持生活。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不谋私利。十年“文革”期间,他的明智之举,遭到了残酷斗争。但他坚信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顽强生活,不幸因摧残成疾而长辞人世。

升平军在恭城

傅 尧

咸丰年间,广西各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各路义军,不立名号,自称某堂。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二十二日,恭义堂领袖朱洪英(湖南祁县人)、胡有禄(广西武宣人)在南宁创立“天地会”由数千人发展到三四万人,从桂南转战到湘桂边境。三年(1853年)五月初九,攻占本县龙虎关,龙虎守军,不堪一击,溃退无遗,起义军趁势攻入湖南永明(今江永)并攻占兰山、临武、嘉禾、宁远等县。

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恭义堂领袖朱洪英率起义军攻入恭城,与原集结在恭城的安义堂许英、合福堂陈永秀(全州人又名满廷科)、刘绍和(灌阳人)、连义堂杨西安(平乐人)合并。配合牛尾洞(今太平)、苔塘、布结的邓正高、邓照龙、唐魁等起义军,联结驻沙子的顺义堂、广义

堂、连我堂等合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联军，共一万余人，皆著红巾（群众称红头巾）。八月初一攻打秧家、西岭，县守备万明魁率清兵、团练围击。八月初四起义军攻占恭城县城，焚烧文武衙门占领仓库粮食，没收殷富财物，知县方铭贤及城守、典史、学博、司训等官员，胁迫居民远避山区。

同年八月十八日，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军攻入灌阳县城，在灌阳建立“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

九月，升平军攻占栗木、龙虎，带领数千人，意欲攻打湖南永明，湖南直隶州知州王鑫，永州游击周云耀率湘勇数千截击，起义军被击退，由栗木退往灌阳。

同年十月，恭城守备万明魁，督团练进“剿”秧家，恭义堂朱洪英，屯驻豸游。后继进龙江口，起义军先锋韦昌和及蒋四、刘大被俘，团练屯驻白羊，连义堂杨西安占据黄埠，抵抗官兵。广义、洪顺、连义、顺义各堂，皆并于连义堂，合为一大股。十二月，山源绅团随万明魁合攻黄埠，常振乾被俘，杨西安在三门堡筑栅固守，兵分五路迎击官兵，因兵力分散，各堂败退，杨西安退回沙子。

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忠义堂刘五、广寿堂余翥文（武生）、刘振乾（廪生）攻入庄子埠，后合并连义堂杨西安，与早归连义堂杨西安指挥的从义、聚英、合福、广义各堂起义军合为一股共约数千人。

同年八月十二日升平军定南王胡有禄于湖南四明山，被王鑫湘军所俘牺牲。八月十五朱洪英、陈永秀率升平军由四明山退至观音阁转攻恭城，行至定岗勘受恭城知县汪荫桂、

把总温鹏飞的官兵，团练阻击，不能前进，退回灌阳。十一月进攻永明，十二月占领江华。

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朱洪英、陈永秀由江华转战广西富川麦岭，歼清军300余人，在回师江华时，朱洪英被湘军所俘牺牲。陈永秀、黄金亮收编朱洪英起义队伍，进驻恭城北乡石头村开馆，休整训练。七月攻入观音阁、文村商坪等地，在恭灌一带分立五营：黄金亮居中营，陈永秀为左营，卢维新为右营，郭二嫂（女，广东人）为前营，廖四嫂（女，广东人）为后营。汪师帅带领千余人驻守黄牛寨，互为犄角。由宋国遇、陈戊养协助。至此升平天国起义军扩充、收容、改编发展到二万余人，恭、灌、永、富一带的起义声势日益壮大。

咸丰六年（1856年）七、八月，平乐知府招敬常，游击祥英，招抚了在恭城被打散的零星起义军500余人，编为“功勇”与委员林伟畅所率领的“潮勇”600余人合师，由乐湾“进剿”，经过8天鏖战，由于清军、团练众多，轮番追击防堵，本县北至栗木，东至马鞍山、龙肚，西到平乐、阳朔交界处，被围得水泄不通。起义军誓死抵抗，死伤枕藉，首领林海见清军防堵严密，料难逃脱，只得投降受抚。合福堂陈永秀、黄金亮在栗木乘虚突围，在灌阳重整旗鼓，于十一月再攻兴安，十二月占领灵川。

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湖南巡抚骆秉章，派候选知府蒋益澧统领湘军，江宗甯统领楚勇围攻全州、兴安、灵川，陈永秀七月败退平乐，与连义堂杨西安合师共三万余人，攻入平乐府城，占领沙子、二塘。九月楚军驻扎恭城，

攻击沙子、二塘之起义军。平乐同知段瑩器、守备陶昌培采用离间、诱降手段，杨西安遭俘，被处死。官兵乘势四路搜捕起义军，横直扫荡200里，起义军3万余人被杀牺牲，陈永秀率败兵退走贺县、昭平。

升平军领袖胡有禄、朱洪英，杨西安相继牺牲，起义军在清军、团练的重重“围剿”下，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但前后坚持了八年，最后被清王朝镇压下去。

红军佯攻龙虎关

——俸 艳——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分别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和于都出发，开始了闻名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突破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向西行进时，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电令湖南军阀何健，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派兵在湖南零陵至广西桂北一带，部署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歼灭。李、白接令后立即调兵遣将，调集了四万民工，在灌阳、全州、恭城、贺县，湘桂交界之关隘，如龙虎关、雷口关、高木关、永安关、清水关等地修筑碉堡工事。李、白还调动廖磊的第七军以及平乐区民团，布防于贺县、富川、钟山及恭城等县，并把主力放在恭城的龙虎关。龙虎关是湘桂交通要道，他们估计红军有可能由此关入广西。龙虎关地势险要，南北有高岭相夹，中仅一路，真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国民党反动派就利用这优越的地势，在龙虎关修起了四道工事，第一道是围墙一样的铁丝网；第二道是埋于地下的竹签，铁钉；第三、四道是壕沟和碉堡，死死把守这一关口。他们还把桂北各县的县长，全部改派有作战经验的军人充任；并在城镇、学校、农村，加强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是到处抢掠，杀人、放火、强奸的，无恶不作的军队；胁迫群众埋粮，躲进深山，妄图隔离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将红军困死、饿死。同时实行“五户联保”，即通“匪”（指红军）者杀，窝“匪”者杀，济“匪”者杀，知情不报，五户连坐（连坐，指连同定罪）等。他们还强迫群众每户出竹签和铁钉，（炒干后用尿泡过，刷上桐油），交给民团埋设于交通要道，（后来有不少的红军进入广西桂北境内，被这种暗埋的竹签、铁钉戳伤脚部，因伤口化脓溃烂不能行走而掉队），以阻碍红军通行，这样在桂北一带出现了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红九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了湖南江华城，红军一方面军攻占了道县，前锋部队逼近广西灌阳与湖南交界的蒋家岭，准备突破敌人有重兵部署的湘江封锁线。这时，桂系反动军阀白崇禧，深恐红军攻占恭城，贺县进入广西，便紧急命令廖磊的第七军加强防守。红军于二十五日占领永明（现江永县）县城，并分兵一部佯攻龙虎关，（“探得有十余万到永明，将由龙虎入境”见《民国·恭城县志》卷二、九十五页）红军部队到达关外，与桂军十九师和平乐区民团展开激战。同时，红八军团则由永明南下，威逼富川。这一下，搞得白崇禧六神无主，昏头转向，他立即命令放弃湘江防

线，调回兵力守住恭城和富川，这样从全州至兴安、灌阳之间的百里湘江，已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防守，红军主力部队抓住这一良机迅速进入了永安关、雷口关，在灌阳文市和水车架起浮桥渡过了灌江，控制了湘江两岸，占据了渡河点，逼近了全州县城，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这是我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次红九军团佯攻龙虎关、红八军团南下威胁富川时，桂系主力已被牵制到恭城至富川一线，调开敌人主力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八、九军团随即掉头转向道县，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与大部队一起乘胜前进。

搜 剿 与 招 抚

——嘉会区剿匪斗争片断（续）

周积伟

1951年1月13日在白燕山大逮捕匪桂东区游击司令、12军军长周天雄所部全歼并将周天雄枭首示众后，极大地镇慑了残匪。县委指示嘉会区委乘胜前进，继续追歼。我们嘉会区委工作队和区中队30多人于1月24日（农历庚寅年12月17日）进驻九板乡狮子桥开展工作。入村后立即去群众中访问，调查了解情况。当工作队员王维新在访问刘予同老师时，获得狮子桥背后白竹垒有散匪活动的情报后，我们即与头一天从湖南粗石江过来剿匪，驻扎在狮

子桥的一个解放军排的领队副连长联系，共同前往搜山围剿。同志们怀着一种对土匪十分愤恨，恨不得立刻把他们歼灭的迫切心情，马上集队急行军前进。不到一小时就进到垒里，区中队长萧魁率领战士走在最前面，解放军战士紧紧跟随。他们一股劲往上爬，见到一处杉树丛底下有一个简陋的茅棚，并发现一个人从茅棚里钻出来急速往上爬。白竹垒里树木不多，灌木茅草茂密，战士们见到匪徒的身影后，干劲顿增，立即冲上去叫其站住，并高呼“缴枪不杀。”土匪哪里肯信，继续逃跑并企图开枪顽抗。我战士立即开枪，一梭子过去，就将匪徒击毙了。战士们一拥而上，见被击毙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匪和一个女人，男匪手里拿着枪，枪膛还顶着子弹哩！在搜索茅棚时又抓到一个女匪和一个娃仔。一问，女的叫彭孝英，是鸭婆桥黎金想的老婆，新寡，是被土匪胁迫上山的，娃仔也是被土匪哄上山的。被击毙的男匪叫余妹仔，女的不知其名。再细致搜查未发现其他匪情。谢队长叫彭孝英把余妹仔的头壳砍下，彭拿着刀，手如筛糠，颤抖不已，根本不敢下刀，后换区中队战士把余的头壳砍下，叫彭孝英捧着下山，挂在狮子桥小学的操场上，这时正是中午。工作队决定立即分头通知九板乡所属各村群众在午饭后至狮子桥小学开会。

群众按时到会，鸦雀无声。会场四周贴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多幅标语，讲台两边贴着：“当土匪，做恶事，昔日威风何在？欺人民，压百姓，如今这个下场！”的对联。余妹仔的头壳就摆在会场的讲台上。场面非常威严。会议由区委副书记周积伟主持并讲话，他主要讲大

逃剿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着重指出现在尚未下山的土匪，要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回头是岸，赶快投诚自新，政府保证本人身家性命全安，如仍执迷不悟，继续为匪顽抗，只能是余妹仔这样的下场。同时号召各村各户，有土匪、通匪、济匪、窝匪的都要父劝子，妻劝夫，兄弟互相规劝，亲朋戚友、知情者相互通知转告，在10天内向区公所投诚登记自新，逾期不下山自新者，进行追剿搜捕，从严惩办，决不宽贷，言出令随，克日肃清匪患，安定地方社会秩序。随后区委又召开招抚小组会，有县招抚委员黎绍棠（地方绅士，前县教育局督学、国民党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九板乡人）、付定边（嘉余街长）、刘江（九板乡狮子村村长）及有关人员参加。会后，工作队深入匪户做政治思想工作，叫他们劝亲人下山，投诚自新。经过三四天的动员发动，进一步深入交代政策，就开始有人到区里登记自新。到第六天，匪第12军第4师师长余伟年，匪12军参谋长余贺年，匪第4师独立第2营营长韦刚、副营长王东元，相继下山投诚。为稳定思想扩大影响，区委还特别设筵席给以招待。为方便接待投诚，我们又在狮子桥增设接待站，匪军需主任黄建国等5人就近下山投诚，我们也开欢迎投诚大会，同样给以宴请，尽量扩大影响。凡投诚人员我们均签发自新证。证书由县公安局统一印发，盖有县人民政府大印，由接受自新单位负责人签发。自1951年1月24日至2月3日的10天里，计有匪师长1人，参谋1人，正副营长4人，正副连长12人，匪众21人下山投诚自新。他们是余伟年、余贺年、韦刚、王东元、黄建国、史贵甫、黄懒王、黄权、陀雄、钟天